

《黄色墙纸》——从自我走向英雄之路

李秀敏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辽宁, 115000)

摘要: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发表于十九世纪末, 当时被评论为疯癫女人的话语。本文以文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视角重新解读这部作品, 并立论作品体现女性对自我追求和觉醒意识的文学积极功能。文中女主人公及女作家吉尔曼因其与社会商讨自我的努力被认定为女英雄, 提出重新建构和谐的两性观, 关爱女性。

关键词: 写作; 疯癫; 自我商讨; 女英雄; 意识。

1. 引言。

《黄色墙纸》, 这部经典短篇小说 1892 年出版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之初, 被评论是一个神经失常的女人的疯话。自传体灵感激发的叙事论述了一个女人一步步陷入疯癫的故事。作者吉尔曼在女儿出生后险些被私人医生的“卧床疗养法”逼疯。文中女主人公的不顾医生、丈夫的告诫隐蔽地记录了对丈夫和黄色墙纸背后的“女人”的思维图解。通过对女主人公与墙后“女人”等同的刻画, 作者吉尔曼设法与医生米歇尔辩论“卧床疗养法”并不适合于女性产后抑郁的恢复治疗。女主人公要求时间和空间进行文艺创作, 丈夫约翰百加阻挠, 强制其接受卧床疗养, 避免任何活动。男性残缺对女性的理解, 丈夫封闭妻子如封闭精神病患者, 不能不说明对女性的意识形态曲解了女性的正常职业追求。这些只能通过幽灵形式出现的女人也是文学意义的灵魂, 正如 Gilbert 和 Gubar 称之为“阁楼里的疯女人”(Gilbert and Gubar, 2000:3)。

本文中女英雄(Heroine)有两层含义。字面上它是文学作品的女主人公;另一个是不惜一切代价为争取某种事业奋战的英雄人物, 她们超越一切障碍和压迫, 英勇地反抗直到最后成功。《黄色墙纸》的女主人公, 被认为是失败的女英雄, 因为她疯掉了。尽管如此, 70 年前, 即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颠峰时刻, 作品成为唤醒女性社会地位意识的原动力。没有这些受伤害的女英雄形象, 女权运动无法在充分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到更广泛深入的程度。Shapiro 在她的《不可能的女英雄》中断言——“在传统的意义上, 她们表面上看并不英雄化, 这些女英雄是不可成立”(Shapiro, 1987:3), 与之相反本文认为从作品的意识启发作用上, 建立在文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平台上, 她们是真正的女英雄, 女英雄并非要赢到战斗的最终, 我们现在无法界定女性问题的最终解决的极限。女英雄并不代表胜利者, 因为她们受到父权制度的侵害。她们的受害存在于自我的商讨与父权制度的残酷现实的紧张对峙中。

本文探究女性追究自我和她们遭受的命运机制。因果关系的分析是本文的理论方法。结尾对社会学范畴的展望, 突出了这部作品的文学社会功能。论述过程涉及对《黄色墙纸》这部经典女性文学作品在两个层面的并列分析: 吉尔曼通过个人经历直言女性的歇斯底里和疯癫, 以自传体形式对女性的职业定向的意识形态进行谈判;作为密切关注女性的社会学者, 她的质疑、商讨、建议改变了父权制度下的两性读者的女性观;《黄色墙纸》不仅改变了文学传统, 也改变治疗女性神经紊乱的传统方法;主人公牺牲正常的自我, 以疯癫换来父权的妥协, 她的牺牲对后来者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女性的觉醒意识的呼吁将女性自我的重新建构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当代读者无一例外认可作品的建立和谐两性观的重塑作用, 表现在

呼唤社会对女性的理解，男性加入到两性和谐对话中来。

2.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自我危机。

自1935年吉尔曼去世，她的作品在文坛中被遗忘了。如果她被人提起，通常也是与她的理论著作《女性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她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虽然在70年代被视为经典作品，当时却被忽视。是Karl Degler 1956年的文学评论，将吉尔曼的作品重新挖掘出来。60-70年代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最终将它纳入进美国经典文学的殿堂中。不难看出，人们的女性问题的角度转向了性别问题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对于吉尔曼遭到的文学排斥主义，Degler 悲叹于文学的父权影响。实际上，对女性文学不公正的忽视，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美国文学界当时的现实。尽管如此，Degler 注意到“如果大家能够同意，过去的50年，美国人改变了对妇女的看法，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为她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应获得很大一部分殊荣”（Degler, 1981:26; quoted Meyering, 1989:23）。

这部杰作的力量存在于吉尔曼对父权文化和文学传统对女性艺术家的压制的深切关注。通过这个短篇，吉尔曼进行了一系列的女作家文学自我和女性整体自我的探讨。不管女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多么丰富，难以超越对女性社会角色的严格限定的意识形态——十九世纪定义的女性家庭职责的世界。女性必须是贤妻良母，做天使而不做魔怪。天使意味着沉默、顺从、柔弱、病态的女人。虽然如此，吉尔曼既非天使亦非魔怪（Gilbert and Gubar, 2000:89）。她是人文谈判者，提供女性读者另一个角度看待那些沉默的天使女性所不敢谈及的主要性别问题：女性从属地位的起源；在人类关系中获得自治和融洽的努力；在自我定义中职业自我的中心作用；重新建构女性社会角色自我的新策略，如家务劳动的专人负责的分工制和两性的和谐等。《黄色墙纸》，虽然没有体现她所有的关注，突出了女性受封闭和设法逃脱的主题。它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典范案例，讲述出一个所有文学女性“难言的痛苦”（Gilbert and Gubar, 2000:89），这个难言的痛苦是通过女主人公得以表达出来，实际上，也是女性作家的呼声。Hegde 指出：“女人是婴孩或残疾人；女人甚至是病菌体”（Hedge, 1992:129）。这些形象在吉尔曼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如果她们是男人眼中正常的形象，女人也就接受并同化于这些形象了。所以不奇怪看到疯癫和自杀充斥了19世纪晚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所有被冠以的称呼及附加的形象都是父权制度的产物。

《黄色墙纸》基于吉尔曼的个人经历。十九世纪多数中上层女性婚后成为家中天使，这些女人的才能和智慧是不能在公共范围内得以施展的。她们的职责是牺牲自我以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再有就是管理好家庭事务。但是，不是所有的女性认为她们苦于这种角色，一些女性并不认为这些限制是压抑和窒息的，比如作品中约翰的姐姐珍妮。正是因为吉尔曼具有不同寻常的思想，她要更富于野心和想象离力。这样的女性更容易感到压抑，如果她们没有释放的空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许多证据证明大量的精神疾病摧残了中上层阶级女性。抑郁、心力交瘁、歇斯底里等都是许多医生和女作家的笔触。同样，男性因过度工作也患有以上症状。女性的痛苦尤其糟糕，是因为症状归结于女性内在的缺陷或脱离了观念的生活方式而招致的结果。米歇尔医生对于女性的症状做如下分析：“因不幸福的婚姻、乏味劳累的日常生活，导致中上层女性当中的歇斯底里症状，是因为这些女性的缺乏生活的目的性——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生活”（Mitchell, 1880:65 quoted in Lane, 1990:118）。

看起来米歇尔医生对女性的精神失常持有偏见，他对女性抑郁的真正病因——自我追求无法得到回应和实现，理解甚少。父权控制和压制看来根本不在征兆之列，因为这些医生不会相信，他们的权威诊断是错误的。不仅如此，1890年米歇尔医生在一次报告中，甚至表达了他的观点——女性垮掉了是由于教育对身体和精神的影响。他认为“我不希望女性成为牧

师、律师、演讲家” “到家庭之外去工作，女性会威胁到她们的健康，那么她们未来将是披肩和沙发” (ibid, 119)。米歇尔医生认定吉尔曼曾经多发的歇斯底里是她过度工作的结果。因此，他提出要 “懒下来”，不仅在身体上还有精神上。只有远离脑力劳动环境，让自己惰于思考，不做任何和职业有关的工作才能对治疗有帮助。他直到去世之际仍然坚信传统女性就是要做衣食有保障的女人，滑向 “新女性” 方向的女人会陷入危险。他的理论和 “卧床疗法” 造成吉尔曼和女主人公的伤害。

一向崇尚独立和事业的吉尔曼发现自己卷入了无休止的家庭琐碎，它们阻碍了绘画和写作。家庭角色与职业自我的冲突让她逐渐有了叛逆意识：“家庭远不是美妙，让我神经疲乏，心情聊赖，家庭生活意味照顾，劳作和失望，沉寂不被注意的旋涡吸走我的青春，热情和美貌” (Gilman, 1903:12)。正如 Carrol Smith-Rosenberg 所总结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确定的女性的美德和十九世纪歇斯底里的病兆特征相同：依赖，柔弱，情绪化，自恋” (Smith-Rosenberg, 1972:671)。随着抑郁的加重，她绝望地看待母性角色，此时她的丈夫丝毫感觉不出吉尔曼想要什么。“沃尔特看不出我被生命，被生命不可逆转地困住，不，除非他死了，孩子死了，或者他改变，或者我改变，别无它路” (Gilman, 1902, ed. Lane, 1990:89)。如她所描述，“我不能读也不能写，也不能画画，不能缝纫，不能讲话，或听别人讲话，什么也干不了。我躺在沙发上，整日哭泣。我就爬进孤零零衣橱里和床底下——好躲避深切痛苦的不堪忍受的压力” (ibid., 121)。最终她致信她的丈夫“你使我成为现在的样子！” (Gilman, 1990:215) 遭受周期性的抑郁，开始怀疑 “卧床疗法” 的作用。吉尔曼着笔在《黄色墙纸》中刻画自传体的疯癫。需要指出的是，吉尔曼从未将本人与女权主义者等同起来。她只是有了对女性问题的自我觉醒意识，她已经开始审视她的自我和社会期待之间的两难窘境。

“卧床疗法” 实际没有医治吉尔曼，相反，摧残了她。回家疗养也必须遵照米歇尔医生的疗养指导：“尽可能过家庭生活。让孩子在你身边。每餐后卧床一小时。每天只能有两小时的用脑时间，只要你活着永远都不要笔” (Lane ed., 1990:96)。这个建议对于一个追求职业自我，已经开始设计她的职业生涯，要当作家和画家的女性，结果无疑是无效的。然而，自我与夫权制度之间的冲突还是存在并加剧着，不管女性多么努力地去争取，因此结果表 “我回了家严格地遵照这些医嘱数月，最终险些疯掉 (Lane ed., 1990:121)。

随后，反叛的意识在她 1887 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可窥见一斑 “我决定从身体上甩掉米歇尔医生，做我喜欢做的”。首先她改革了生活方式，按照个人意志从事写作和绘画，同时兼顾家庭事务。她拒绝表面看起来幸福的生活还有权威的精神病医生的治疗理论。勇敢地向世俗挑战是她与父权制度对女性的行为和归属定义的第一步商讨。应该说，《黄色墙纸》是我们迄今听到的吉尔曼最具反抗力的呼声。追求自我并不意味着以疯掉告终，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问题出在吉尔曼的丈夫和医生对女性情感和社会要求的不理解。她日益加重的歇斯底里直接源于男性控制权利的意识形态。不难看出吉尔曼对自我的主张受到社会制度的封闭，找不到出路的她当然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抑郁之中。她的人生经历对后来研究女性社会地位是宝贵的，幸运地是，她没有像可悲的女主人公那样疯掉，在 1898 年与丈夫分开后渐渐康复。对于她个人的自我主张，她是成功的。

吉尔曼是一个胜利者，她的作品带来了转变。在她 1913 年出版在先驱者杂志上的短文《我为什么写〈黄色墙纸〉？》中，吉尔曼说出对女性疯癫问题的细腻笔触，她提到 “多年后有人说这位伟大的专家向他的朋友承认自从读了《黄色墙纸》，他改变了治疗女性神经衰弱的方法”。她补充说，写作的目的在于 “拯救人不被逼疯，它实现了” (Golden, 2004:47)。从米歇尔医生的方面说，他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他对女性抑郁的误解

以及“卧床疗养法”的不对症，但一份未出版的打印稿含糊地指出：“这个领域著名专家”曾声称自从读了它改变了治疗的方法”（Gilman, 1990:120）。令吉尔曼高兴的是，她与父权医生和丈夫的对话，在特定的阶段，实现了目标——让人们理解，为女性还有正确的事情要去做。她在 Howells 的信中称这个故事是个“成功”！（Dock, 1998:23）

因此，吉尔曼这位世纪之交的女作家成功地解决她自己的自我危机，同时为那些女性受害者的自我与父权制度进行商讨。如果我们不否认两性之间的和谐可能，她的商讨恰恰是增进理解，恢复平衡，制造和谐的有利途径。自我完全可以重新构建，但要考虑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再有就是以和谐为中心的对话可能。再者，我们还要承认，女性作家严肃而有意识地进行文艺创作。吉尔曼，在创作之初，将目标读者定在米歇尔先生身上，就是要改变其对女性整体的看法。而且医生的朋友和吉尔曼的同代男性都是吉尔曼的视线所在。丈夫应该是吉尔曼最为关注的目标读者，因为疯癫不仅是要治疗的病症，而是要防止的社会问题。简言之，吉尔曼改变了社会制度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她是为令人尊敬的女英雄。通过她令人信服的受害经历和对无名女主人公的刻画，她影响了医生“懊悔对治疗危机中的女性的恐怖理论”（Salmons and Waugh ed al., 1991:263）以及男性读者对女性可成就的自我的予以理解和支持。

3. 《黄色墙纸》中的写作和疯癫。

《黄色墙纸》是对年轻母亲追求自我而变为疯癫的论述。她的疯癫，我认为，与所谓的过度追求事业无关，因为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女性来说，工作不能摧残生命，相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父权制度，意识形态的压制而导致的，可以从女主人公的丈夫遵照米歇尔医生的卧床疗养中发映出来。丈夫的过度保护令女主人公觉得压抑。作品中显然残缺两性的有效交流和理解，因此，吉尔曼以小说商讨女性自我主张并探索对产生的疯癫结果有建树性的解决对策。

讲述者“我”被送到一个禁锢的环境进行紧张症的康复。周围的人对她叮嘱休息，睡觉，尽力“自我控制”（Gilman, *The Yellow Wallpaper*, 1989:3）。在这个“要人命的鬼宅”。“我”觉得房子怪得令人窒息，她的房间糊着黄色的墙纸，而且床被钉到地板上，窗子钉上了封条，金属环固定在墙上。而且丈夫约翰把她看作是个孩子。如果没有被当成一个独立个体，一个不受限制的人格，她的境遇就不会改善。约翰代表了父权制度，对妻子的思维的控制实际上是制度与个体自我的制约关系的体现。尽管如此，吉尔曼赋予女主人公思考、想象的能力，“我”认识到自己是被丈夫儿化并嘲讽，这是社会定义她们的命运——“结婚的人都能预想到的”（ibid., 3）。父权制度男性在婚姻契约中的权威得以建立，同时它破坏女性的思维独立。约翰具有作为丈夫和医生的双重权威，他确诊妻子的病症，决定妻子的最佳治疗方法。他的控制可以总结为“阅读的权威——他来理解妻子表达的意义”（Showalter, 1986:52）。主人公不能阅读，写作和交流要取决于约翰。当女主人公受到抑郁的折磨时，约翰不以为然，他缺乏的是对病人的疾病和心理的知识，妻子的无助也没有改变丈夫对她情况的正确见解，因为约翰“根本不相信我病了，我能怎么办！”（Gilman, 1989:2），约翰自信的确诊无非是暂时性的神经衰弱，并无大碍。女主人公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进行交流，正如女性作家的写作意图找不到知音，周围的人把她的抑郁都想当然，“说的都一样”（ibid., 31）她现在是被孤立在了“对话的交流”（Kolodny, 1986:52）之外。结果自然是“约翰和其他人相信‘我’不应该工作，直到我再好了”（Gilman, 1989:3）。

女性属于家庭生活的意识形态对约翰有影响，因此，男人不会同意工作对女人合适。女主人公视工作为职业的自我。而女主人公却被禁止写作，她唯一的表达自我，定义自我的

释放口被封闭,她推崇写作是“另人兴奋和改变的合适工作“,她确定写作“对我有益”(p. 2)。面对丈夫的横加阻拦,一个人能怎么办?这个问题包括女作家在内都试图回答,这种无奈是女性问题的主要特征。环境的封闭,职业自我的禁锢,造成她日益加重的抑郁。丈夫让她放弃“愚蠢的幻想”(Gilman, 5)而只能“考虑自己的病态,在这种情况下,女主人公把注意力转向了黄色墙纸。

注视黄色墙纸,试图解析上面的图案让女主人公找到了自我的感觉。起初,黄色墙纸给她的印象是刺眼的、污秽的、可憎的。她对墙纸的反感可以从她的话语中体现“难怪孩子们恨它,要我在这住常了,我也会恨它”(The Yellow Wallpaper, 3)。但后来她与墙纸后的女人等同起来,因为她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活动。这时女主人公可以任意思考,自由想象。女作家和主人公的想象是她们要从压抑中冲脱出来的象征。从自由想象到写作,女主人公验证了她的自我的可塑性。这位年轻妻子每天都要避开亲人的监视而写作。秘密写作,动脑筋避免被发现,就是为了防止亲人们对她的反对和指责。她同时也告诉我“那张纸上写的除了我没有谁能看懂,即使想看懂”(ibid., 10)。它暗指了女性视觉的独特性,当然与男性的不同。吉尔曼肯定了两性评论家的角度差异,同时唤起读者兼收并蓄的解读观。这种商讨也是具有建设性的。

女主人公表面看来柔弱、神志不稳定,却经历了一个从无能到能干的过程。起初的她怨天尤人,害怕被人发现她写作,当她开始沉迷于与墙纸后面的“女人”的对话时她不再有愧疚感,完全自主地思考和想象,并且得出结论只有她能够“明白这写‘女人’而其他人达不到”(ibid., 10)。她重获自我,不顾丈夫的威胁“如果我不快点好起来,他秋天就会送我去米歇尔医生那里”。她知道落入米歇尔医生之手的后果,她不畏惧,坚持记录下她与墙后“女人”和约翰的对话。她按照墙纸图案解析其中的玄机,终于她发现“坚强的、令人心惊的、无形的人鬼祟地出来”(ibid., 9)。她的意识回应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几天之后,她认定“一个女人在图案后面弯着腰四处爬行”,由于她只能在夜间与其对话,主人公确定她和墙纸后的女人一样,受禁闭。墙后女人出来时,女主人公断言“我醒了”(ibid., 13),她终于明白了图案和人物的意义,“没有人能看出来,只有我能”(ibid., 14)。注意到墙后“女人”要挣脱出来,自己也要上了封条的窗户逃出去,她“愤怒地搬动床甚至咬下了床的一角”(ibid., 20)。女主人公经历了从软弱到坚强的精神成长的过程,她抖落掉父权禁锢宣布:“我必须工作”(ibid., 18)。她要帮助墙纸后面的女人“出来”。更重要的是,她认识到了“自由自在地爬行,即便珍妮让我出去我也不去”,可以看出,发叛的意识已经形成。

接近尾声,女主人公吃惊地发现丈夫也沿墙爬行,看来也是疯掉了。她这时宣布:“我终于出来了,不管你和珍妮如何,我把纸都撕掉了,你们别想再把我放回去!”(ibid., 20)读者立刻对她话语就会认定,她疯了。而我认为她的疯癫证明了成功的逃脱。Hedge 把女主人公的结局看作是“被打败”(ed. Golden, 1992:128),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相反,我认为根本就没有被打败,她大获全胜。她帮助了那些受禁锢的女人逃脱出来,改变了受害女人的状况。如果从文学传统的角度,她建立了文学女性的新的话语系统。吉尔曼在“我为什么写《黄色墙纸》”中坦白她的目的是挽救那些“逼成疯癫的女人”(ed. Golden, 2004:47)。疯癫并不是盯看黄色墙纸所致而是受父权制度的囚禁和压抑。因此说,吉尔曼利用个人体验设法帮助那些已经受囚禁,和有可能遭受相同命运的女性看到事实和原因。由此,不管上女主人公还是吉尔曼,她们为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她们是真正的英雄。

4. 结语.

在赞颂吉尔曼这位 20 世纪初的女英雄作者的同时,我不免要思考那些受害的女英雄们。她们的自我主张的发展基本有两种趋势:1、与封闭的环境决断,在家庭之外获得独立,并最终返回到幸福的家庭生活中;2、为了追求自我,无法回到“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在父权的文学、社会制度中自我毁灭,或者我们在吉尔曼作品中看到的落入疯癫。《黄色墙纸》以传统的音符结束了尾音,它的意义在于并不是要返回到传统中去,而是通过哀婉的旋律撞击我们的思考。觉醒于自我,质问婚姻所衍生的母性、家庭、疯癫、伤害、甚至死亡的问题,难道就是必然吗?诚然,女英雄的声讨自我,或作者的主张自我要付出与社会常规相背离的代价,自我孤立是自愿的选择同时也是必然。是否返回到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去;是否认命,看来女英雄不愿妥协,在无路可走出两难境地的情况下,精神失常成了无法选择的命运——正如《黄色墙纸》所证明的。疯癫在《黄色墙纸》中当然是我们哀叹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使得女英雄跃然显现:“她们牺牲了,她们被消灭了;大多数经常,而且是最令人心痛地,就她们对社会的英勇的挑战来说——她们成为了英雄”(Neher, 1989:25)。

疯癫的不可避免性是所有读者的关注的焦点,结局的安排应该是发人深思的。她们命运的倒向让我们不仅要问,正如吉尔曼要商讨的——女人能拥有她们所主张的吗?如果两性的紧张消除,与父权主义者的谈判能够得到理解,我不会否认它的可能性。女英雄的诞生是可能并且必然的。因为她们以命运为代价,只为读者的心灵的共鸣。主人公启发了自己的意识和读者的意识来拷问女性命运的核心,此举已然是英雄所为。她们进一步将读者的同情心和自我反省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谐的两性观,更是英雄主义的充分体现。女主人公的悲剧式塑造,更大程度上,加强了作品的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

对于寻找主题和形式来表达自我的美国女性作家,她们证明了女性文学也经历了成型、进化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觉醒形成了她们的文学自我。在证明女性写作力量之时,女作家利用她们喜欢的人物形象代表对文学功能的挑战。理论家 Jauss 曾所述:“文学有力量改变社会的期望”(Jauss, 39, quoted Harris, 1995: 199),吉尔曼的作品《黄色墙纸》改变了文学,乃至社会学的地平线。这部小说,毫不夸张地说,建立了女性觉醒意识文学的传统,补充了女性写作传统,构成了她们的体验性文学历史。然而,他们想以对话的方式或谈判来改变。Adrinne Rich 曾说“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从新的评论方向进入老的作品,这才是求生方式”(Rich, 18, quoted Fetterley, 1981: Preface VIII) 那么,现在我们看待作品的女主人公及作者,她们的行动难道不是义举?在现代看,对她们的重新评价也应是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英勇的反叛的确是超前地面对所处的地位并觉醒要改善它。

这部文学作品堪称“女性读者迷失在美国男性文学的荒野之中的自我保护求生手册”(ibid, VIII)。吉尔曼,以她少有的胆识和见解,通过女性经历阐释世界,同时通过改变女性读者的意识来改变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作家所做的是,如 Andrea Dworkin 指出的:“写书因为她们尽忠于书的内涵。我希望这些作家著书改世。我希望作家写书能够让人们知道如何,为什么我们生活得不同?我想要作家写书哪怕是值得为此入狱,值得为之战斗,为之牺牲”(ibid, X)。我因此相信吉机曼作为世纪之交的女性作家,当她将意识变为力量来改变世界的时候,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同样,许多女性作家通过文学揭露和质疑社会中存在的女性的神话和复杂权力思想,这些不仅要公开更要改变。当然,质疑和披露需要相对激进的意识来完成。如果将作品应用到社会学领域,文学从未停止反映指导生活的经历。如前所述,借古明今。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提倡和谐社会,和谐的两性关系中不容忽视女

性的弱势问题。和谐共荣,是女性作家的诚恳愿望,我相信也是全社会的利益。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联合会促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最终的目的是防止女性受伤害和树立起更多的女英雄。

参考文献

- Degler, Carl N. *At Odds: Women and Family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eminism" A . Sheryl L. Meyering, e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The Woman and Her Work*. London: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 Dock, Julie Bates.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The History of its Publication and Reception* M .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Gilbert, Sandra M. "Life, studies, or speech after long silence: feminist critics today." J College English 40(April, 1979):850.
- Gilbert, Sandra M. and Gubar, Susan.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Nota B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The Home: Its Work and Influence* M .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and Company, 1903.
- ,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Other Writings* M .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9.
- , *The Living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M .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 Golden, Catharine, ed. *The Captive Imagination: A Casebook on "The Yellow Wallpaper"* C . N.Y.: The Feminist Press, 1992.
- Golden, Catherine J. e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A Sourcebook and Critical Edition* C .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 Harris, Susan. *19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Novels: Interpretative Strategies* M .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 Kolodny, Annette "A map for rereading: or, gend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J . New Literary History (Spring, 1980):455.
- Lane, Ann . *To "Herland" and Beyond* M ~ N.Y.: Pantheon Book, 1990. Meyering, Sheryl L. e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The Woman and Her Work* M . London: UMI Research Press, 1989.
- Mitchell, S. Weir "The true and false palsies of hysteria" *Medical News and Abstracts* J ~ (Feb. 1880): 65.
- Neher, Irene. *The Female Hero's Quest for Identity in Novels by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D . N.Y.: Verlag Peter Lang, 1989.
- Rich, Adrienne.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M . N. Y.: W. W. Norton, 1976.
- Russ, Joanna. *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 What Can a Herione Do? Or Why Women Can't Write?* A Susan Koppelman Cornillon ed.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72.
- Shapiro, Ann R. *Unlikely Heroines: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Woman Question* A .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 Showalter, Elaine.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M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 Showalter, Elaine. ed.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M . London: VIRAGO Press, 1993.
- ,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M . New York: Oxford Uni. Press, 1994.
- Smith-Rosenberg, Carroll. "The hysterical woman: sex roles and role conflict in 19th-century America," J ~ Social Research 39:4(Winter:1972):671.
- ,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M . New York: Knopf,

1985.

Welter,Barara. "The Cult of Ture Womanhood" J. ~American Quarterly 18(1966):151-174.

Yalom Marilyn, *Maternity, Mortality, and the Literature of Madness* M. University Park,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On the Road From Identity to Heroine In "The Yellow Wallpaper"

LI Xiumin

(Yingkou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Dept. Yingkou, Liaoning,
115000)

Abstract: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was published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recognized as a woman's insanity discourse at the time. Upon interpreting it interdisciplanrily with sociology, this paper will draw upon its positive literal function-----voicing women identity quest and arousing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woman writer, Gilman are acclaimed as heriones for their identity negotiations. This paper aims at reconstruction of hamonious bi-sexual relationship and caring for women in the society.

Keywords: writing; insanity; identity negotions; heriones; consciousness.

作者简介: 李秀敏(1973-),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英美女性文学.